

狐狸知道所有事

# cì WEI

这刺猬站在一边

蕭三廩著

一刺  
一件  
猬

事只  
知  
道

你我都想知道这件事



这刺站  
一邊  
猬在

蕭三匝  
齋

南海出版公司

2016·海口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站在刺猬这一边 / 萧三匝著 . —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6.10

ISBN 978-7-5442-8371-7

I . ①站… II . ①萧… III . ①杂文集—中国—当代  
IV . ①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26458 号

ZHAN ZAI CIWEI ZHE YIBIAN

站在刺猬这一边

---

作    者 萧三匝

责任编辑 张 媛 雷珊珊

策划编辑 钱午骏

特约编辑 王佳碧 黄 鹏

美术设计 刘庆海 杜 敏

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0898) 66568511 (出版)

(0898) 65350227 (发行)

社    址 海南省海口市海秀中路 51 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570206

电子信箱 nhpublishing@163.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金泰源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50 毫米 × 970 毫米 1/16

印    张 22.5

字    数 312 千

版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8371-7

定    价 49.80 元

---

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 自序：那个心如死灰的老头儿 //

我常常想起祖父来。

祖父讳克恭，年轻时，可是一口唾沫一颗钉式的人物。镇里有个谚语口碑：“箫（萧）吹不得，鳌（敖）扳不得，汤（汤）喝不得”，说的就是我们那里的三大家族。

我家那时很排场，镇上临街的铺子都是我们的，乡下还有几十亩地，家里长工、短工不少。祖父当了多年保长，虽然严厉，却也乐善好施，遇到灾年，就开粥厂，任由人喝，不收钱。

我见过他年轻时的照片，白衬衣、蓝裤子、一双锃亮的黑皮鞋，英姿勃发。即便是今天，乡下人也没几个有他那样的风度——一种乡村绅士的风度。

后来呢，革命了，家里顷刻间就败了，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祖父是作为反革命分子被关进旺苍监狱劳改的，祖母的成分是地主，留在家拉扯两个儿子。抄家以后，就典了敖家的房子住。

因了那可以想见的原因，祖母从此成了挨打专业户。有一次，民兵连长要枪毙她，枪都上了膛，幸好被我家当年一个本分的长工拦腰抱住

了。祖母的命保住了，但右手的筋却被打断了。那个长工后来告诉我，我们的祖父母都是好人，当年他给我家干活的时候，东家从来没有亏欠过他钱粮。

还是在抄家前，祖母在天井的香樟树下埋了一坛子银圆。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她叫父亲去挖那坛银圆，不想父亲半夜行动时，被人逮了个正着，又是一顿打。想到这里，我的泪快流出来了。

那时节四川有一种跑单帮的盐贩子，专挑了自贡井盐游走贩卖。有一个姓任的盐贩子，走到我们那个地方的时候，见祖母可怜，愿意帮这娘儿仨，祖母就和他组建了家庭，伯父和父亲也改姓了他的姓。

但这无法改变祖母的出身。到伯父和父亲成年的时候，没有姑娘愿意嫁给一个反革命和地主的儿子，实在没办法，伯父就入赘到了尚家，父亲也直到三十多岁才娶到同样出身的母亲。母亲是二婚，性格刚烈，受不了贫农家庭出身的前夫歧视，终于离婚改嫁给了父亲。在我哥哥出生以后，母亲曾带着哥哥去牢里见过几回祖父。回来说，祖父在矿里挖煤，人瘦得象麻竿，身体也不好，得了肺病，喘起来象拉风箱似的。一家人就只有陪着祖母摸泪。

大概是 1970 年代后期吧，祖父服满 20 年刑期，回来了。他的反革命分子帽子被摘掉了，不久祖母的地主帽子也摘掉了。

我不知祖母是否和我叫任爷爷的那个男人办过结婚手续，她在世时，作为晚辈，我几次想问她，也没问出口。我想说的是，祖父回到家时，见到的是祖母和任爷爷在一起，自己的儿子也已不和自己一个姓了。我想，人生最大的悲哀，不过如此吧。但对他而言，除了理解自己的弱妻，又能怎样呢？

祖父回来后，按政策，祖母和任爷爷就分开了，父亲两兄弟也姓回了原来的姓。但任爷爷只有一个女儿，早出嫁了，按乡间习俗，也没有赡养他的义务，政府就决定让我家腾出一间房子给他住。因为年龄大了，没有生活来源，公社把他算成了五保户，每年给他一笔数额极少的救济款。这笔钱需要申请，任爷爷不怎么识字，就得请人代写。我上小学的

时候，他总是央着我写，祖母支持我帮他这个忙，父母也不反对，我也很乐意为他效劳。于是，我们就找来一张板凳，他说，我写。那大概不过只是一个必须的手续，我写的申请每次也都在公社通过了。

任爷爷个子很高，瘦，穿一身洗得发白的长袍，有机会就给我和哥哥寻摸点好吃的东西来。

我现在想起他，还感到非常亲切。

祖父寡言了，也不说个人是非和他在牢里的生活。他如今的作息很规律，大约是上午在家里，下午去镇上走走。在家里总是躺在床上，床边放一个大痰盂。他依旧喘得紧，大口大口地吐痰。他几乎从不和家里人一起吃饭，需得孩子们给他端到床前。有时我给他端饭，便看见他用头猛烈地往墙上撞，声音很大，我吓得不知怎么办才好。去问父亲，父亲说祖父有头毛病，撞撞墙可能好受些。他经常吃一种白色的头痛粉，似乎也能管点用。

祖父去镇上，只为喝茶，他从不向家里要钱，也从不给茶馆付茶钱，茶馆老板也从不问他要钱，只是笑脸相迎。有时候祖父也带我和哥哥去喝茶，老板见了，客客气气的，叫一句：

“老太爷，孙少爷来了——”随即就抓出一把水果糖给我们吃。

祖父也不说谢，只管喝茶。

我似乎觉得祖父的做法有些过于傲慢了，父亲解释说，那个茶馆老板是我家当年的长工。

祖父从来不帮家里干活，母亲说他是“油瓶子倒了都不扶一下”的人，因此对祖父怨言日重，有时就说些伤人的话给祖父听，比如说祖父是“活死人”“劳改犯”之类。祖父拖了笤帚就撵着母亲打，母亲其实是怕祖父的，于是跑开了。祖父追几步，又喘了起来，也就不追了。

在我们那里，如果媳妇对公婆不好，公婆就喜欢出去跟别人说，但祖父从来不向人说母亲的不是，他大概觉得自己对不住这个家，也理解母亲操持家务的辛劳吧。不过，要让他重新回到 20 年前，那又怎么可能呢？

他是冷漠的，冷得像一块永远捂不热的冰。他对我们小孩子也不拘言笑，不过有时也会摸摸我们的头，或者允许我们帮他抓抓痒、装装烟袋，那时我们可以见到他少有的慈祥，就像一口古井冒出的气泡。

祖父歿于1986年夏天。那天早上下了一层雨，我们一家人一早就出门了。出门前，我到祖父的房里拿斗笠，还和他说了几句话，没发现他有什么异常。出去不到一个小时，邻壁张家婆婆就急忙忙跑来报告：老头儿怕是不行了。我们匆匆赶回去，祖父已经往生了。从他死后的形容看，他走得很安详，并没有受多少折磨。我想，死对他来说，或许反倒是一种解脱。

后来收拾他的遗物，发现他的几个笔记本上用钢笔写满了“毛主席语录”，他的字很好。我不知他内心里是否已经完全服膺了新时代的思想，据我的观察，好像是的。

任爷爷比祖父晚死几年，他死于孤老，女儿不愿料理他的后事，父母只好代为料理了。

祖母生于己未年，前几年才死的，活了九十多岁。祖母信佛，或者说是信因果报应，从我记事起，就知道她万事不挂心，她早就宽恕了曾经伤害过她的人。我工作后，回老家总是给她买点软和的点心吃，也给她留一些钱，她每次都对我说感谢的话。想到这里，我的泪又要下来了。

20年前，父母把祖父葬在屋后，祖母死后，就葬在祖父旁边。祖母十几岁时就作为童养媳到了萧家，现在，她又可以继续去陪伴她孤独的丈夫了。

人间何物最伤情，波心冷月寂无声。

祖父于我是一团幽魂，我的敏感与刚强，我的光荣与梦想都是他所决定的。很小的时候，我就在想，祖父那点儿产业，要搁在改革开放后，实在是不好意思拿出来说事儿的。新时代大力激发人的创富本能，既然如此，当年为何要消灭富人呢？家族之兴衰事小，生民之苦乐事大，我们这个国家，能不能跳出永远翻烙饼的历史怪圈？

位我上者，静穆苍穹；引我思者，万川奔流。是为序。

# 目 录

自序：那个心如死灰的老头儿 // 001

## 辑一 思想

想起了李泽厚悲怆无尽	//	002
中国当代思想界之一瞥	//	017
左右不为难	//	031
高全喜：左派是诗，右派是散文	//	066
知识分子五论	//	075
论乾清宫梦中行走杨度	//	094
姚洋教授，经济学等于小说吗？	//	106
从吴晓波看知识分子的可能姿势	//	115

## 辑二 文化

杜维明：没有批判精神，儒家就死了	//	126
秋风：温情对待传统	//	138
致孔夫子的一封信	//	155
不要神化南怀瑾	//	160
写给活着的辜鸿铭	//	173
学罢西洋掉头东	//	181
马未都很痛苦	//	195
这个和尚说，佛教不是让我们坐以待毙	//	200

### 辑三 社会

吴敬琏：打破“党国大公司”	///	222
华生：户籍何物	///	230
秦晖：让农民自由起来	///	245
江平：我所能做的是呐喊	///	258
张千帆：司法改革走了回头路	///	269
《反垄断法》是不咬人的狗	///	279
阎步克：短期内，巨变几无可能	///	289

### 辑四 公民

企业家醒了吗	///	298
刀笔刘震云	///	316
我所认识的那个野汉子	///	338
清清爽爽的周濂明明白白地活	///	344

附录 不是诗	///	351
--------	-----	-----

## 辑一 思想

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

——杨万里

## 想起了李泽厚悲怆无尽      ///

又到岁末，窗外大雾，心情压抑。忽然间想起了远在美国的李泽厚先生，不禁悲从中来。先生 85 岁了（李先生生于 1930 年），不知此刻，他在想些什么。我知道，他的心情也不会好的。

我生于僻野，少也孤陋，上世纪 80 年代李先生执思想界牛耳、全国青年望风景从之时，我才不满 10 岁，自然无从知道先生。90 年代初，先生去国赴美，国内沧海桑田，我更无从知道先生。直到 2008 年，我小住沪上，问及朋友牛二波：“当今之世，哪个中国人的书最值得读？”他答：“你可以读读李泽厚。”

二波乃隐逸之士，读书既多，见识复高，他推荐李泽厚，我于是听真了，回头就买来了李先生的几本书读。哪知道这一发就不可收拾，以至于读到了如饥似渴的地步，以至于在此后一两年我读光了李先生在大陆出版的所有著作，而且不是读一遍，他的很多书我都读了两三遍。

—

钱钟书说，你吃鸡蛋就行了，何必要见到下蛋的老母鸡。我不这样看，果如钱先生所言，古时读书人之间的交游就没有意义了。事实上，见到老母鸡是有助于加深对它下的蛋的认识的。

读李先生的书越多、越深，我就越想拜谒先生，好在他每年夏秋之季都会回国住几个月，就这样，我在2010年8月17日见到了先生，在中国社科院分配给他的宿舍里。房子不大，客厅甚至有些局促。先生怕冷，时值仲夏，他在家里不开空调，穿着睡衣，身上还搭一条毛巾被。他回答了我关心的所有问题，末了我提出了一个不情之请，他在香港出版的书能否送我一套。他在香港出了两本书：《告别革命》《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他家里只有前一本，转身就送了我，且答应下次送我后一本。

对话录后来辗转发在《南方周末》，反响极大。李先生的朋友、学生看到后，也纷纷表示赞赏，认为我的提问和李先生的回答均好。李先生也很欣慰。前两年他出新书《该中国哲学登场了？》，他还托出版社编辑征求我的意见，最终把那篇文章收进了新书的附录里。

通过这次访谈，李先生觉得我还比较用功，对他的思想也比较了解，因此也很愿意与我继续交流。此后，他回到美国，我就经常给他发电子邮件请教问题。比如，我想研究清末改革是因何覆灭的，列出了李鸿章、梁启超、杨度三个研究对象，他就建议我研究李鸿章，因为李鸿章处晚清军政、外交要冲，一生务实，非他人可比。国内出了一套《李鸿章全集》，售价24000元，我向他感叹价格太高。他说，研究李鸿章也未必需要读他的全集。

李先生著述宏富，包括美学、哲学、儒学、思想史等领域，我总以为当下的中国人对他的重要性认识不够，就想与他做一次长篇对话，先生也同意了。我拟了近两百个问题，发给他，他打印出来，在纸上做了

简要回答。但他又觉得过于简要，还是决定暂不传真给我，待他日见面我们再详聊，哪知道直到今日，这一计划也没有完成。原因是，他的身体不好，每次回国，我打一两次电话，知道他身体染恙，就不便再致电叨扰了。

2012年我们又见过一次。那次陈明、干春松、唐文明等教授请李先生茶叙，先生让我也去参加，他还专门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带给了我。他们聊的是儒教，这不是我最感兴趣的问题。茶叙结束，我扶先生回家，趁机才问了自己感兴趣的话题。路上闲聊，他问我对王蒙的看法，我说，“王蒙进不了文学史”，他笑了。他对国内文学界关注不多，问我国内是否有出色的作家，我给他推荐了刘震云，因为刘震云是时代的批评家，老辣、幽默，他听得很认真。

两次面谈，他给我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是，他对媒体人和企业家寄予厚望，反而看不上国内的学术界。特别是2012年这一次，我们在他家楼下惜别时，他明显流露出对我们媒体人的殷殷期盼。我对国内的一些事情表现得有些急躁，他说，不要急，小步走，慢慢来。

2014年，中国发生了很多事。李先生也出了新书《回应桑德尔及其他》，新见迭出。他在国内待了几个月，还到上海的大学做了一些讲座，谈公正问题。我给他写了一封长信，问他对范曾等人流传广泛的诗作的看法，以及他之所以关注公正问题是否是因为中国到了必须正视公正问题的时候了，他的回信相当简洁：近来老病相侵，不想说任何话。我理解他的心情，更希望他保重身体。突然想起2012年那一次他和几个教授临别时的对话，陈明教授邀请李先生明年再聚，李先生的回答让大家一怔：“前提是明年还活着。”陈教授主张建立儒教，他的话接得也很快：“我们儒教会保佑你的。”逗得李先生和大家哈哈大笑。

多年以来，我总是追问谁堪称中国当代思想家，结果应者寥寥。什么样的人配称“思想家”？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说法，但似乎并没有所有人都公认的定义。既然如此，我也可以有我自己的定义：

一、思想家是自问自答的人，他既出题，又解题。他必须有敏锐地

找到大问题的能力，又必须通过自己的论证为这些问题提供足以说服人的答案。所谓大问题，就是人类的根本困境，而且首先是思想家所处的社会面临的重大困境。受问题意识的指引，思想家痛苦地思考、精确地表达。

二、思想家是时代的瞭望者。他能超越一己利益，着眼于人的解放。因抱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之志（我故意删掉了“为往圣继绝学”句，原因见后文），他总能看得比普通人远一些、深一些。

三、思想家必须独立思考。他平视、甚至俯视一切人，甚至先贤大哲。这并不是因为他狂傲，而是因为任何人都不能为他所思考的问题提供现成的答案，他只能从先贤大哲那里寻找灵感和启示。这样做并不意味着他对先贤大哲不敬。“六经责我开生面”，对思想家而言，不能“我注六经”，只能“六经注我”。因此，从本质上讲，思想家必须具有原创力。

四、独立思考并不是无所依傍的同义词，思想家依傍的是历史和现实。基于历史感和现实感，他虽然瞭望时代，但并不描绘乌托邦。他知道，描绘乌托邦是文学家的活儿。

五、思想家的言说必须自成体系、逻辑周延。所谓体系，至少应该打通“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的逻辑链条。偶出妙语，甚至妙语连珠能称得上是才子，但称不上是思想家。相反，恃才是思想家的大敌，因为恃才者往往夸张，而思想家必须理性。

以此标准来衡评李先生，哪一条都做得很好。以此察诸国内学者，往往顾此失彼，大多数人不过是常识宣传员、解构主义者、站队者、媚众者，尤其是原创性，几人能够？

现在我可以明确地说，中国当代思想家不会超过五个人，而李泽厚的确是思想家。我拜访过不少学者，一些人认为，李先生已经过时了，李先生是可以超越的。我以为，这基本上是一句废话，你倒是拿出超越他的作品来呀！

我们或许可以将同辈学者与李先生作一对比。与李先生同辈的学者中，王元化先生知名度很大，但王先生提出过什么原创性的观点吗？海外华人学者中，余英时先生堪称人中龙凤，但余先生主要还是一代学术大家，而非思想家。余先生的新著《论天人合一》中的主要观点，李先生30年前就提出来了。我这样说，并非厚此薄彼。事实上，余先生是思想性很强的学者，李先生是有学问的思想家，二人努力的方向和禀赋不同而已。对中国来说，有思想的学者和有学问的思想家都稀有，也都极有必要。那么，相对年轻的一辈学者呢？秦晖先生庶几近于李泽厚，尤其是在现实性和历史感方面，二人都甚为着意。但秦先生至少缺少一本提纲挈领式的理论著作。我曾当面向秦先生提出建议，希望看到他的纯理论式的代表作，他也表示有此写作计划。

需要说明的是，我在学界师友众多，不少人也写出过相当好的著作，也带过我很大启发，之所以作出如上论定，并非抹杀师友贡献，更非存意造次，还望知者谅解。

我个人最感兴趣的是李先生的政治思想。不过，李先生是以哲学家的身份成为思想家的，因此他的很多论述只负责提供一种宏观视角，点到为止。比如，他提出的“中国进步四顺序说”（经济发展—个人自由—社会正义—政治民主）固然是对的，但他并没有详细论述这四步之间的互动关系，也没有论述每一步完成的标志是什么。

李慎之先生在冯友兰百年诞辰纪念会上的发言中，主张对冯友兰的思想要“接着讲，借着讲，通着讲”，这是相当高明的主张，强调的是后来者创造的主体性。我今日之悲怆，一是因为李泽厚先生多年前提出的问题这个国家至今仍然没有解决，二是因为尚未有本土思想家能接着李先生讲。

时代需要思想家。

## 二

以下是我2012年与李先生的对话，彼时他满头飞雪，走路也得依靠拐杖了，但思维依旧敏捷，你还没说完，他就知道你要说的是什么。臧否起思想和人物来，他还哈哈大笑。

在这次对话中，他的核心观点是“民主的门不是冲出来的”。话题从他推崇的康有为开始。

**萧三匝：**是什么原因使你对康有为倾注了如此多的热情？

**李泽厚：**我先从反面来回答这个问题。看了奥斯维辛集中营，我有很深的感受。原来我老说百无一用是书生，现在看也不见得，一个错误的理论会导致非常坏的结果。纳粹理论是非常低级的理论，但当时在德国居然举国若狂，包括一些高级科学家都信。我们搞理论的人，应该有责任意识，至少要防止错误的理论。所以，易中天问我：“中国应该走哪条路？”我讲，问题应该是“中国不能走哪条路”，我们应该警惕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合流。我非常愤慨的是，到重庆去站台的那些学者，不都是理论家吗，他们的责任感何在？

我认为有必要梳理一下以下几位理论家：

一是卢梭。他讲公意，这就造成了后来的人民民主专政。

二是马克思。讲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但一个社会主要是靠阶级和谐、妥协才能生存下去，靠天天斗是不行的。马克思、恩格斯本人都承认，奴隶社会比原始社会要残酷得多，但这是历史的进步。所以我一直强调伦理主义与历史主义二律背反的问题。什么时候伦理主义占上风，什么时候历史主义占上风，值得深入探讨，但把阶级斗争作为历史发展的动力是错误的。我承认，现在也有阶级矛盾，富士康那么多人跳楼不是阶级矛盾是什么？但从大的理论来看，应该强调阶级的和谐、

妥协。庄子就反对一切文明的异化，连用机械都不行，“有机事者必有机心”，那人干脆回到动物世界去最好了。人是从动物进化来的，动物为什么会进化成人？我认为，人类是自己把自己创造出来的。

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讲“劳动的两重性”。在他的理论里，抽象劳动引导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引导出按劳分配，然后到按需分配。这是有逻辑可能性的，但没有经验基础。按康德的说法，先验幻想是不能成立的。先验幻想好像宗教一样，能够鼓舞人心，能够起一种积极作用，十字军东征不就是打着上帝的旗帜吗？圣战不也是打着真主的旗帜吗？

三是尼采。虽然现在各种左派都把尼采奉为圣人了，讲半句坏话都不行，但我从来对尼采不感冒。他导致的就是纳粹，蔑视群氓，那是赤裸裸的，所以希特勒也是赤裸裸的，就我这个种族行，其他种族都不行，犹太人是最坏的。如今有人张口闭口就是海德格尔、卡尔·斯密特，这些人都是尼采右派，都是走向法西斯主义的，他们不是讲上帝跟魔鬼的斗争吗？尼采左派是福柯，走向无政府主义。这都是尼采种下的恶果。

搞理论的，你提出什么，至少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萧三匝：**是否可以说你之所以关注康有为，是因为他与上述三个人都不同，他的理论是一种建设性的改良论？

**李泽厚：**对。今天我们梳理中国的自由主义路线，把严复摆在前面完全是误解。1949年以前，大家都知道，改良派是康、梁，革命派是孙、黄，严复在知识界中根本就被冷落了，是毛泽东后来才把他加进去的。不过，现在炒严复、梁启超，主要是受西方的影响。

我到今天还关注康有为，还有一个重要的考虑是，我想提出一个“中国的自由主义”的概念。从康有为到现在，确实可以清理出中国的自由主义的演进路线。中国的自由主义当然要讲自由、民主、宪政、平等、人权这些普世价值，按康德的话说，就是“人是目的”，但中国的自由主义与西方经典的自由主义有很大的不同：